

《国语·周语》“奉礼义成”辨析

胡文嘉

(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)

提 要 《国语·周语》“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”章有“奉礼义成”一句,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指出其当读为“仪”。然考诸文义与文献用例,“礼义”或宜仍读如原字。“礼义”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晚期以来“礼”“义”思想内涵的转变。

关键词 国语 周语 经义述闻 礼义 礼仪

《国语·周语》“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”章记述周襄王派太宰文公和内史兴去晋国赐命,晋文公接待王朝使臣礼节完备,举止恭敬,内史兴复命时从礼和忠、信、仁、义的角度向襄王详细论述了晋国必霸的原因。文中的“逆王命敬,奉礼义成。敬王命,顺之道也;成礼义,德之则也”一句,韦昭注“奉礼义成”云:“谓三让、宾、餼之属皆如礼也。”(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,1978:42)董增龄(1985:125)采用韦注,未有申说。王引之(2017:1174)指出“礼义”即礼仪,“义”当读为“仪”,而非“仁义”之“义”,又云“忠信仁义,别见下文,与此‘义’字不同,古书多以‘义’为‘仪’,说见《礼记》‘别之以礼义’下”,此后徐元诰(2002:36)亦采此说。

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指出古书中有以“义”为“仪”的现象,这是符合先秦文献用字实际情况的,但韦《注》以“如礼”解释此句以及《经义述闻》进一步将“礼义”读为“礼仪”的做法则仍有令人疑惑之处。

其一,内史兴的这段论述中,“义”字的使用共有三组,即“奉礼义成”,段落中间的“忠信仁义”以及在解释“仁”的时候所说的“施三服义”,前者自韦《注》起,各家多释为“仪”,中间的“仁义”之“义”各家未有异议,而最后的“施三服义”之“义”,韦《注》解作“得宜”之“宜”。如此,则在这段短短四百字有余的论述中,“义”字这个形体不仅要记录“仁义”之“义”这个义项,还要分别借为“仪”“宜”二字,这样的情况恐非古书常例,且有违文字使用规律。

其二,韦《注》的解释侧重晋文公的仪节,《经义述闻》指出忠信仁义“别见下文”,“礼义”之“义”不当同义重复。然而,后文亦见有“施三服义,仁也”“行礼不疚,义也”之说,“义”与“仁”“礼”同现,可见“礼”与“义”在内涵上可以各有侧重,而不必有截然的界限,“礼义”之说并非无据。

其三,以传世文献用字作为判断依据存在不确定性。王引之在“礼义”条中指出古书常以“义”为“仪”,在辨析《礼记》“别之以礼义、礼义立、制之礼义、义不一”的条目下,指出几处“礼义”均当作“礼仪”。王引之仅基于传世文献分析出“义”和“仪”的字际关系,这是非常可贵的,当今所见的出土文献材料也证实了从人的“仪”字产生较晚,古书“仪”字多借用“义”或其他同声字表示^①。然而这恰恰也表明,目前所见传世文献用字大多已非原字,故而在判断“礼义”的读法时,文献用字虽可作为参考,但恐怕难以确证其是或其非。

愚以为,结合文义和文献用例来看,“礼义”读如原字是可行的。《周语》内史兴的此段论述在各层次之间存在对应关系。为后文论述方便,现将此段中与“礼义”相关的六句论述逐句对应引用如下:

(1)逆王命敬,奉礼义成。敬王命,顺之道也;成礼义,德之则也。则德以导诸侯,诸侯必归之。且礼所以观忠、信、仁、义也。

(2)忠所以分也,仁所以行也,信所以守也,义所以节也。

(3)忠分则均,仁行则报,信守则固,义节则度。

(4)分均无怨,行报无匮,守固不偷,节度不携。

(5)若民不怨而财不匮,令不偷而动不携,其何事不济!

(6)中能应外,忠也;施三服义,仁也;守节不淫,信也;行礼不疚,义也。

一方面,从文义来看,内史兴对周王所作的这段分析,按其原本的叙述顺序,可依次断为六个大句。首句先总述晋文公对“王命”和“礼义”的态度,并指出通过“礼”可以观察一个人秉行忠、信、仁、义的情况。之后的(2)至(6)句层层推进,每一句内

^① “义(義)”从“我”得声且与“宜”同音可通。“仪”写作“义”的典型用例如《诗经》等传世文献中常见的“威仪”一词,在目前所见的西周直至春秋晚期的金文中均写作“威义”。战国时期的借用之例如郭店简《尊德义》简26,荆门市博物馆(1998:57、174)载此简图版和释文“义”的字形均写作“義”,陈伟(2002:154-156)将简文此句释读为“不以嗜欲害其义(仪)轨”,其中“义”读为“仪”,“仪轨”指“规范、法度”。再如荆门市博物馆(1998:17、129)载郭店简《缁衣》篇简2所示,简文引诗“仪型文王”,“仪”字作“愁”,而马承源(2001:174)所载上博简《缁衣》简1的相应位置“仪”字形作“壘”,“仪”均使用从“我”声的形体记录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(2007)和吴镇烽(2012:449)载战国中期《中山王厝壶》(《集成》09735)铭文拓片和释文,壶铭评价燕王唵禅位于子之,说二者“不用豊(礼)𠄎(仪)”,“仪”借用从“宜”声的形体。可见战国时期用字情况趋于复杂,古书原字多不直作“礼仪”,“仪”所借用的形体是多样的。

部都按照“忠”“仁”“信”“义”的顺序具体分析。以“仁”为例纵向来看，“仁所以行也”，“仁行则报”，行报则能“(财)无匮”，做到“施三服义”即为“仁”也。内史兴阐述“仁”，认为人应当施行“仁”，“仁行则有恩”，进而则能财用不匮乏，做到“施三服义”即是“仁”。“施三服义”句，贾逵云“三，谓忠、信、仁也”，韦昭注“施三，谓三让也。服义，义，宜也，服得其宜，谓端委也”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，1978:43）。《周语》此章前文记述晋文公礼节完备，曾以“晋侯端委以入”描述其着装得宜，韦昭将后文的“礼义”解为“三让、宾、飨之属皆如礼”，将“施三服义”解为“三让”和“服宜”很可能都是应和前文而来的，以礼仪、礼节之说贯穿始终。然而，由“仁”之内涵纵向递进的意义层次来看，行“仁”与施恩、财用不匮乏有关，因而将“施三服义，仁也”解为着装、礼节合宜，实与前文不类。此句或仍以贾逵之说近是，行仁之人，能够遵行忠、信、仁之礼，且能做到节制之义，此即仁善之所在。再由纵向层次看“义”的递进，“义”这项准则的作用在于使人有“节度”，有所节制而不至贪得，因而没有差错地践行“礼”即可称为“义”。由此可知“奉礼义成”之“义”属于思想准则方面的内容，而非“仪”所侧重的举止、仪节。

另一方面，传世文献中不乏“礼义”一词读如原字的例证，尤见于诸子文献。如《管子·七法》“成功立事，必顺于礼义；故不礼不胜天下，不义不胜人”（黎凤翔，2004:117），由“不义不胜人”可知“义”必读如原字而不为“仪”，且该句中“礼义”与“成功立事”的关系与《周语》“奉礼义成”相类。又如《管子·霸形》“近者示之以忠信，远者示之以礼义。行此数年，而民归之如流水”（黎凤翔，2004:454），所论之事为齐桓称霸，与《周语》内史兴论晋文必霸类属相同，且对“近者”和“远者”分别展示“忠信”和“礼义”的区分方式，也与《周语》内史兴区分“忠”“仁”“信”“义”的论述方法相似。再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“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”，赵岐注云：“何暇修礼行义乎？”（阮元，1980:2671）可知此处之“义”也不读为“仪”，“礼义”连言为辞表示礼法仪节和行为准则。这些例证表明，至少在关于上位者为政的论述中，“礼义”一词的使用并非个例。换言之，古书中存在这样一类“礼义”，其意义涵盖仪节和准则。

综上，通过对文义和文献用例的考察，《周语》“奉礼义成”之“礼义”读如原字是合理的，“奉礼义成”所指的不仅是晋文公在举止、行动上恪守礼节，更是在说内史兴由仪节观之，确定晋文公是具有治国兴邦之德义的君主，因而才做出了晋文“必霸”的论断。“礼义”和“礼仪”尽管在字形上只存在小别，但其反映出的内涵值得重视。“礼”和“仪”的区别在《左传》中已有明确体现。昭公五年晋侯向叔齐问鲁侯之礼，后者指出鲁侯所做的“郊劳至于赠贿”，“是仪也，不可谓礼。礼所以守其国，行其政令，无失其民者也”（阮元，1980:2041）。又昭公二十五年记赵简子向子大叔问揖让

周旋之礼,后者说此揖让周旋“是仪也,非礼也”(阮元,1980:2107)。可见时人对于外在的仪节和内在的准则已经进行了明确的区分。原本的“礼”融合思想、行为和相应制度为一体,而这种情况自春秋晚期以来已经发生了改变,出现了分离和独立的趋势。晁福林(2007:220,241-242)在对春秋社会及思想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指出,“礼”和“仪”逐渐产生区分的根源在于“社会结构的变动”和“礼的重要性日增”,“仪、法二者逐渐从礼中分离出来,但它们又与礼有着密切联系,反映了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于礼的不同要求”。与此同时,由于原本的“礼”是行为、制度、思想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体,因而它也具备了侧重任何一方面的可能。本文所讨论的《周语》篇章中有云:“礼所以观忠、信、仁、义也。”可知“礼”是观察一个人秉持德义情况的窗口,这个“礼”是偏重外在仪节的。而所谓“奉礼义”之“礼义”,即是将春秋以来分化出的举止之“礼”和道德判断之“义”结合起来的结果,这种提法与当时社会结构和时人思想的转变息息相关,也是社会环境变化作用于语言和思维的体现。

参考文献

- [清]董增龄 1985 《国语正义》,巴蜀书社。
- [清]阮元(校刻) 1980 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。
- [清]王引之(撰) 虞万里(主编) 虞思徵 马涛 徐炜君(校点) 2017 《经义述闻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晁福林 2007 《先秦社会思想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。
- 陈伟 2002 《郭店竹书别释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。
- 荆门市博物馆(编) 1998 《郭店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。
- 黎凤翔(撰) 梁运华(整理) 2004 《管子校注》,中华书局。
- 马承源(主编) 2001 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马承源(主编) 2002 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二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(校点) 1978 《国语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吴镇烽(编著) 2012 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徐元诰(撰) 王树民 沈长云(点校) 2002 《国语集解》,中华书局。
-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(编) 2007 《殷周金文集成》,中华书局。

(责任编辑:张阳)